

论江南学术文化的发轫

姜晓云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2)

【摘要】江南学术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身文化“小传统”。为此对江南学术文化的发轫进行研究,探求江南学术文化的起源、特质、范式以及早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母题”价值。水塑的江南及其封闭的地理单元格,是江南地区“文化龛”形成的重要原因;植根于“文化龛”中的自然诗性思想、“襍祥”崇拜及玄虚心态,是江南学术文化的重要源头;“质有而趣灵”是江南学术文化的基本范式,滥觞于季札、孙武等早期江南学者。

【关键词】江南; 学术文化; 发轫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9)05-0071-08

“发轫”一词,出自屈原的《楚辞·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①王逸注曰:“轫,揅车木也,将行发之。”^②“发轫”,意味着新事物的出现或新局面的开始;江南学术文化的“发轫”,指的是江南学术文化的孕育和萌生。《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记载了北方大儒孔融读到江南学者虞翻的《易》注后,感慨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③学术界往往将江南学术文化的发轫定在东汉时期,主要指包括王充、虞翻、赵晔、袁康、吴平、谢夷吾、包咸、阚泽等在内的以会稽郡为中心的江南学者群体的崛起。本文想进一步向前追溯,力求从考古学出土的实物材料和研究成果出发,结合自然地理学、气候学等方面对古代江南的研究,并运用地理环境论、人类文化学等理论研究方式,分析江南学术文化的最初发轫。

一、江南地区“文化龛”的形成

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概念,具有空间形态不稳定性、历时性、内涵丰富性等特征。不同学者对江南地域的界定不尽相同,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除巴蜀地区以外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将全国划分为陕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而此处的“江南”就是指长江以南以及岭南地区。狭义的江南是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地区。胡晓明

从经济和文化角度入手,将清代江南省作为核心区进行研究;李伯重在《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将江南范围确定为“八府一州”,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边缘。”^[1]刘士林在《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一文中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将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看作是江南区域的核心地区,而其他同样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和地区则可视为其“外延”部分或“漂移”现象。本文依据刘士林所提出的概念,将“八府一州”作为江南的核心地区,而其“外延”则是目前的扬州、绍兴、宁波等辖区。

(一)水塑的古江南地区

江南地区东临大海,受海洋气候影响,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河流广布,湖泊众多,是著名的“水泽之国”。受温度与降水的影响,海面时常有波动,当温度升高或降水增多时,海面升高,内侵沿海,低洼地区被淹;反之,海面下降,陆地面积扩大,平原增多。海水的内侵和回落,不断塑造和改变着古江南的地形地貌,深刻影响着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文明兴衰。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姜晓云(1970—),男,江苏沐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在更新世末期,气候寒冷,海平面较低,古长江在大陆架外缘入海,上海地区的海岸线位于现今海平面以下137米的东海大陆架外,陆地面积较大。^④大约在1.1万—1万年前,发生了新仙女木事件,全球性气候回暖、冰川消退,开始进入温暖湿润的全新世。在全新世早期,海面已达到-40米,海水沿谷底侵入,海岸线逐步内退。^⑤从距今8500年前开始到7500年前,温度与降水持续升高,在8000年前左右达到最高值。可见,这个时期江南地区是高海面、高降水的气候条件,能具备人类生存的地方并不多。大约在距今7500年前时,气温和降水量有所下降,海平面上升速率趋于缓慢。^[2]古长江流至长江下游时,地势变缓,河道渐宽,河水挟持的泥沙逐渐沉积,并淤积至近海。在潮汐的作用下,进行重新分配,形成了土地肥沃的三角洲,这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条件。

约距今7000年前,气候温暖湿润,海平面基本稳定,江南地区开始出现先民活动的遗迹,先后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了陶器、稻谷、榉卯、家畜等,还有制作难度较大的企口板,反映了江南灿烂的早期文明。约距今7000—6000年前时,年均温与降水量增高,比现今水平还要高,朱诚等根据长江下游地区古贝壳堤海拔高程和其区域分布状况研究得出:距今7000—6500年前依旧为高海面期。到了晚期,海平面不断升高,长江入海口到达扬州、镇江附近。海水入侵杭嘉湖平原形成大片泄湖^⑥,除一些高岗外,绝大部分被水淹没,先民多在地势相对较高的高陵地带生活,后来一部分迁至苏锡一带的高原上。

约距今6000—5000年前,江南出现了崧泽文化。在崧泽文化早期为高海平面稳定阶段,气候温暖湿润,王开发、张玉兰通过对太湖地区第四纪沉积的孢粉组合分析,此时江南为湿热的中亚热带气候。^[3]中期,气候转为干凉,湖泊面积缩小,从遗址发掘中,首次在本地区发现了水井,这也反映了崧泽文化时期,有段时间气温下降,降水量减少,先民不得不挖井饮水。此时先民仍沿循择高而居的生存方式,崧泽文化开始逐渐发展繁荣,但到晚期后,

气温开始回升,降水增多,水域面积开始扩大,^[4]使先民的生存活动空间减少,文化发展受阻。

约距今5000—3800年前,此时为良渚文化时期,气温与降水虽然有小幅波动,但总趋势是年均温和年降水量都大幅度降低,平均值低于现今水平,海水退去,上海滨海平原西部和杭嘉湖平原南部发育成岸外砂咀,属于低海面时期。江南此时进入了先民最适宜生存的时期,水域面积缩小,平原面积增大,气候宜人,人类采集与狩猎范围也逐渐增大,成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最辉煌的时期。距今4000年以后,气温开始上升,降水增多,海面又开始上升,江水回灌,水域面积扩大,差不多恢复到了6000年之前的状况,江南很多地区被淹没,人类的许多居住地被淹,尤其是生活在低洼或小盆地地区的良渚先民,遭到此次灾害的重创。在阳澄湖湖底考古过程中,就发现了大量良渚文化遗址,从遗存方面来看,这些是属于良渚文化后期的遗迹,这也说明了海水或洪水的侵袭,是良渚文化突然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距今3800年前,进入马桥文化时期,早期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大,海面较高,太湖平原环境较为恶劣,湖泊和沼泽广布,先民生存空间狭小,其遗址主要分布在太湖东部与上海西部之间狭长的区域范围,文化发展缓慢,因此目前发现马桥文化早期遗址数量较少。到了晚期,气温开始下降,降水量减少,湖泊面积减小,海面降低。在马桥时期起到防洪和阻止海水内侵作用的砂堤两侧都发现了先民生活的遗迹,尤其是东侧发现了许多遗存,也正反映了马桥文化晚期,海平面下降,海岸线东移,先民的生活范围扩大。

总之,从考古学、沉积学和地理学等角度的研究,反映了江南地区在全新世时期,气候的冷暖变化与降水多少,影响到了本地区水域面积的大小,尤其是到了约7000年前时,江南文明开始兴起,先民的生存状况与自然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气候的波动直接作用于海水的进退,降水的多少深深影响着本地的旱涝情况。自7000年前左右以来,江南地区不但海面有几次较大升降,还至少出现过9次特大水灾,迫使江南先民不断迁移。当高海面 and 洪

① 朱熹:《楚辞集注》卷1《离骚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② 朱熹:《楚辞集注》卷1《离骚经》,第15页。

③ 陈寿:《三国志》卷57《吴书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19页。

④ 许世远、黄仰松、范安康:《全新世以来上海地区滨海平原发育》,《地貌及第四纪研究进展》1991年第2期。

⑤ 耿秀山:《中国东部晚更新世以来的海水进退》,《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81年第1期。

⑥ D. J. Stanley, A. G. Warne, "Nile Delta: Recent Geological Evolution and Human Impact", Science, Vol. 260, No. 5108 (Apr. 30, 1993), pp. 628—634.

涝期时,就择高而居;当海水退去或降水减少,则逐渐向海岸带推进。^[5]可以说,海水的进退与湖泊水域大小的变化迫使先民不断迁徙和改变生存方式,深刻影响着本地区文明的兴衰。

(二)“文化龕”的形成

由于海侵不断,海水沿河道或地势低处侵入与退回,使江南地区的地形受强烈切割^[6],形成了深切的河槽和相对崎岖的丘陵。这些纵横的河槽和高低不一的丘陵相组合,与众多的湖泊水域共同组成了该地区的地理环境。但随着先民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海陆变化也受到人们活动的影响,先民开荒拓土、围湖造田等生存活动,加快了水土流失,造成长江三角洲河口的泥沙沉积量增加,三角洲面积增大。先民在发展中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多水的环境,多水的自然环境也影响和滋润着早期江南文明。

江南地区在全新世以来,虽然气候有所波动,但总体上讲,江南属于湿热多雨的地区,刘金陵等认为,本地区的气温即便有小幅波动,但当时的气候仍然属于亚热带范围^[7]。因此,江南地区雨水丰沛,河流众多,除了有古长江外,还有古淞江、古娄江、古东江、东苕溪、西苕溪等较大河流,并与众多小支流形成了稠密的河网。据统计,太湖平原每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流长度平均为6至7公里,而杭嘉湖平原则高达12.7公里,是全国水网最为稠密的地区。除了河网密集,此地还有众多湖荡。太湖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历史上有145条水道汇入,而出水道则有169条之多。除了水体面积最大的太湖外,还有洮湖、滆湖等大小200多个湖荡,面积在千亩以上的湖泊有150个。^[8]因此,江南地区的水系格局特点为河网稠密,地表径流与湖荡、沼泽纵横交织。

在更新世晚期以来,随着降水的增多,地表径流也增多,很多平原地区遭到切割侵蚀,如杭嘉湖平原由于长期受到古钱塘江与众多大小支流的侵蚀,形成了呈指状展布的古地形格局,太湖平原地区也一样受到古苕溪等河流的侵蚀,因此江南地区有诸多的河谷与河间地。在地形变化中,三角洲平原上还产生了众多的山地丘陵,这些山地丘陵海拔大多在100至200米之间,也有少数山峰在300米以上。大多山地丘陵属于天目山的余脉,它们因海侵或地壳的沉降,沦为海上的孤岛;有的是经泥沙

沉积而与陆地相连成为突起在平原上的孤丘;有的是山麓冲积扇扩大,将平原上的孤岛变成了孤丘。因此,在长江三角洲的平原上星罗棋布地散布着大小不一的孤丘。

江南纵横交错的河网、湖荡,与平原上散布的大小孤丘相组合,将长江三角洲平原分割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地理单元格。在远古时期,江南先民就生活在这样的地理单元格内。原因在于当时先民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抵御洪水能力有限,他们只能多居住在地势较为平坦的丘陵高地之上,或者在河谷、山麓地区人工填高居住地,以防洪水侵袭,因此形成了江南“人民山居”^①、“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②的生存方式。因独特地形水系的分割,先民居住范围和捕猎范围也就受到了限制,因而在史前阶段,江南地区的部落规模一般不大,多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进行居住和生存。在河姆渡遗址发掘中,根据出土建筑遗迹的范围以及深坑中储存的稻谷重量,估算当时河姆渡应该有两百五十人左右。^[9]河姆渡部落在江南地区已经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了,那其他部落的人口规模估计应该在几十人到一百人左右;而且部落之间被河网、森林和沼泽隔开,交通较为不便,阻隔了部落之间的交流。因此,早期江南地区的聚落,以同一族群或家庭为单位,生活在相对独立的单元格内,活动范围一般不大。

江南地区环境温暖湿润,动植物丰富,加上先民学会了种植水稻和圈养猪、羊等家畜,生活资料相对而言较为易得。从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稻谷、谷壳、鱼类、贝类、梅花鹿、獐等动植物的骨骼与堆积层,还有蚕豆、芝麻、毛桃、酸枣、松籽等干果的种子和果壳,可见,江南先民的食物来源较为丰富多样。“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③江南地区具有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在封闭的地理单元格内食物相对长足,因此在江南原始社会早期发展出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类型,如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

在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格内,一方面创生地的主体文化可以独立生发,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外来文化过度蔓延而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在原始社会初期,江南各个区块文化特征的差异相对明显。根据

① 赵晔:《吴越春秋》卷4《越王无余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5页。

② 赵晔:《吴越春秋》卷4《越王无余外传》,第135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70页。

文化个性差异,学界曾将马家浜文化时期环太湖地域划分成了几个地方类型。^①散落在江南地区各个地方的氏族聚落,在封闭的地理单元格内保持了地域文化的主体个性,形成了无数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格。童恩正曾就指出:“(由于)山峦阻隔,河川纵横,森林密布,沼泽连绵,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的文化龕中(cultural niche)……文化龕之间虽然相互存在影响,但交往却不如北方平原地区那么方便密切。”^[10]“文化龕”的形成与发展,使江南地区的文化在初期,如百花齐放一般自然生发,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多样性,表现出“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长期处在自足封闭、闲暇少争的自然状态之中,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杂花生树’式的自然生发景象,与北方文明‘百川东到海’式的大一统场面明显不同”^{[11]294}的发展逻辑。

二、植根于“文化龕”中的 江南学术文化

“考古资料证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在该文化共同体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是不相同的。即某一地理单元的自然环境能够满足该文化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时,这种制约是有效的。一旦该文化共同体的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冲破这种制约,而面向临近的地理单元扩展。”^[12]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龕”阻碍了聚落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如马家浜、崧泽和良渚文化等都在太湖东岸、北岸范围传播较多,向一水之隔的宁绍地区传播速度较为缓慢;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文化龕”的发展逐渐达到单元格内环境所提供空间资源的限度,这些“文化龕”对于更大范围的融合便形成了阻力,这些文化无法再向更高程度发展,也就制约了先民智慧的成熟。而北方聚落间文化交流频繁,不断通过交往或战争的方式整合地区资源与文化,促进了北方文明智慧的早熟。在史前阶段,江南地区独立的“文化龕”阻碍了该地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文化思想上更多的是对原始诗性智慧的自然延承与发展,习惯于个体情感自然呈现这种诗性表达方式,而不是采用道德认知的方式。”^{[11]295}

(一)自然诗性思想

在诗性智慧的影响下,江南先民在审美方面更多关注于自然事物,诗性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喜好。“由于工具的制作而对物质材料的驾驭以及形式感

获得一种巨大敏感时,它就渐渐引起了一种崭新的审美需要:人不再满足于日常器物的制作,甚至也不满足于器物的造型本身的美,而要想方设法在器物上加上一定的纹饰或从事于一种主要服务于一种装饰目的器物的创造。”^[13]随着江南先民生产力的提高,于是出现了古朴的原始艺术。在许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上,都有一些刻画的图纹。有些学者认为,“主要的几何形图案花纹可能是由动物图案演化而来的,波浪形的曲线纹和垂璋纹由蛙纹演变而来的。”^[14]这些几何形图案取材于先民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一般以自然植物或动物图案为主。多水的江南自然环境,植物种类丰富多样,贝类、鱼类等水生动物众多,多彩的大自然给江南先民带来了艺术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先民通过模仿刻画自然的动物与植物,表达了他们对自然的喜爱,也反映了他们崇尚自然的审美观。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凝冻在、聚集在这种图案符号形式里的社会意识,亦即原始人们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和心理,恰恰使这种图像形式获有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使原始人们对它的感受取得了超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并且在客观形象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都如此。这不是别的,又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萌芽。”^{[15]21}江南原始社会早期的陶器,图案的线条苍劲古朴,既有生动形象的写实图案,又有抽象的写意作品。既有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类,又有水中畅游的鱼类,还有种植的水稻、树木花草等,这都是先民们创作的题材。画面简洁,风格朴实而又生机勃勃,富有生活气息的图纹,表现了江南先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希望。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绘画艺术精美的陶器,如鱼纹陶盆、稻穗纹陶盆、植物纹陶块等,其中鱼纹陶盆采用了抽象写意的手法,一面中间刻着一对兽目,两侧刻有鸟纹;另一面中间刻着生机盎然的禾苗,两旁各有一条游鱼。线条明快,构图简单,达到了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

在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大量的绳纹装饰和几何形纹饰,还有一些陶器上为禾叶纹,常以植物的茎与叶相间排列成三角形,并以此连环续接,绕上一周。这种禾叶纹近10种,线条流畅自然,有繁简、写实和写意之别,主要施于盘、盆的口沿。其

① 陈晶:《马家浜文化两个类型的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0页。

中河姆渡出土的陶器以弧线、圆圈线和卷曲线为主,通过不同线条进行组合成为图案,以不同曲线的综合运用来表达描写图像的外形特征及其内在精神,是河姆渡原始艺术最大的美学特征。^[16]江南先民偏爱于弧线和曲线进行刻画,除了因陶器形状的限制外,很可能与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有关。江南湿热多水,形成了众多蜿蜒流淌的河流,茂密的亚热带植物众多,尤其是藤蔓类植物,弯弯曲曲地生长,这些具有曲折美和灵动美的景物,使先民产生了模仿的兴趣,在模仿刻画的同时,也带给了他们创作与欣赏的美感。

(二)“襍祥”崇拜观念

生活在相对独立的“文化瓮”中的江南先民,一方面,面对海水入侵频繁与洪涝多发的地理环境,对自然产生了畏惧心理;另一方面,温暖湿润的大自然,为先民们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食物的易得又使先民对自然产生了感恩与敬重的心态。在生产力和认知水平还比较低的史前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的神奇性与不可捉摸性产生了敬畏与喜爱。先民们通过祭祀的方式来敬神娱神,因此江南地区早期巫风盛行:“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17]先民们相信万物有灵,对鸟类、蛇类、山神和土地神等自然万物都有信仰,认为自然万物都可以保护他们,形成了泛神论思想,尤其崇拜和信仰吉祥之神。

《吕氏春秋·异宝》载:“荆人畏鬼,而越人信襍,可长有者,其唯此也。”^①汉代高诱注:“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襍祥。”^②《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襍。”^③张湛注:“襍,祥也。信鬼神与襍祥。”^④江南信奉的鬼神与荆楚不同,信奉的多为吉祥之神,人们多信而求佑。在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春祭三江、秋祭五湖”^⑤。《越绝书·内经九术》记载,越国大夫文种策划的“伐吴九术”,第一术就是“尊天地,事鬼神。”^⑥勾践“乃行第一术,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祭陵山于会稽,祀水泽于江州。事鬼神二年,国不被灾”^⑦。江南地区不仅祭祀天地、鬼神、阴阳,而且山

陵、水泽、湖泊、川海等都可以作为神来祭祀,先民认为大自然的神奇在于有神灵的存在,因此,他们相信自然万物都是神灵,而且可以保护他们免于灾祸,确保人、事顺利。

江南先民早期产生了对鸟的崇拜。《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⑧半兽半人的人肯定是不存在的,这样的描述大概是因为江南地区将鸟作为神,为了表示对鸟神的信仰和崇拜,在祭祀或穿着方面将鸟羽作为装饰,因此才有了如此记述。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中,就发现了许多鸟纹雕刻和堆塑鸟图像的文物,如双鸟朝阳的象牙雕刻、圆雕的木鸟、堆塑双飞燕器盖、双头连体鸟纹骨匕和蝶形器上雕刻的双鸟太阳纹等。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许多有鸟纹或鸟形的器皿和玉器,而且在多数台形图案内部,都有一个似人似鸟的图形,良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玉琮上也是刻有鸟纹图案的。张光直认为“琮”在用途上必然是和图腾崇拜的巫术活动相联系的。^⑨1976年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铜钺,其正面图案是四个人身鸟首者在泛舟,这与后来铜鼓上被认为是鸟图腾的“羽人泛舟”图案基本相同。^[18]江南先民将鸟作为图腾神崇拜,大概是江南适宜的气候,鸟类众多,而鸟类特别是候鸟的出没、叫声、生育等活动,是和种植、节令、气候等自然变化相关的,先民将鸟类的这些功能和活动视为某种征兆,并附会鸟所具有的神力,将其视为沟通上天的使者,或是神灵的化身。尤其是鸟类所具备的飞翔本领,是先民们所向往和羡慕的,自由地遨游于天际,既代表着一种超越阻隔的神秘力量,也代表了一种悠然自得的诗性精神。

江南先民除了将鸟作为图腾神崇拜以外,还将蛇图腾作为神来崇拜。从江南地区出土的几何印纹陶来看,就有学者认为,陶器上的几何印纹是和江南地区的蛇图腾崇拜有关。云雷纹“可能就是蛇盘曲形状的简化”,或是由“蛇身上的花纹演变来的”,波状纹“可能是蛇爬行状态的简化”,三角形纹的来源“应该是五步蛇的斑纹”,还有一些陶器上的圆点纹“可能是眼睛的简化”^[19]。而且江南地区有

① 高诱注:《吕氏春秋》卷10《孟冬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② 高诱注:《吕氏春秋》卷10《孟冬纪》,第101页。

③ 张湛注:《列子注》卷8《说符》,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96页。

④ 张湛注:《列子注》卷8《说符》,第96页。

⑤ 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14《越绝德序外传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

⑥ 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12《越绝内经九术》,第83页。

⑦ 赵晔:《吴越春秋》卷5《勾践阴谋外传》,第182页。

⑧ 郭璞注:《山海经》卷6《海外南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

⑨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3页。

断发纹身的习俗,《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引应劭曰:“常在水中,故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①其断发纹身的习俗恐怕不仅仅是因为纹身像龙而不加害这么简单,而是断发纹身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的宗教行为,闻一多指出“他们短发文身以像龙,是因为龙是他们的图腾。”^[20]李泽厚根据马家窑出土的彩陶人的纹样研究指出:“马家窑发现的彩陶人首纹样,看来是‘断发文身’的,而‘断发文身’并非为‘装饰’,‘美观’,它首先具有巫术礼仪的重要含义。”^{[15]31}“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②这都说明了江南先民纹身是一种出于信仰的原始宗教行为,而在身体上纹刺“龙”的花纹(“龙”的花纹其实就是“蛇”的花纹,因为江南地区称蛇,也叫龙,比如江苏宜兴地区至今称家蛇为“苍龙”,浙江杭嘉湖地区称之为“天龙”)。

(三)玄虚的生命哲学

“使中国哲人兴味盎然的水是现于大江、小溪和农田的灌溉沟渠中的水。这是雨和由降雨形成的水潭,寻常普通而非无边无涯,它滋养了生命并为众人所体验。从这种最常见与最多变的自然现象的沉思冥想中,中国哲人找到对生命的基本原则的理解。”^[21]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中国哲人喜欢对常见而多变的水进行思考。面对多水的江南,先民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影响。在文明初期,江南先民也会同世界上其他人类文明开始一样,会思考自己来自哪里,以及世界的源头在哪里。这时他们往往会想到滋养他们生命的水,就像印度最古老的典籍《梨俱吠陀》对世界的起源思考一样:“那时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既没有空中,也没有那外面的天,什么东西转动着(或:覆盖着,包孕着)?什么地方?在谁的保护下?是不是有浓厚的水?”^③水在静止的时候,具有清澈透明的特点,“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④当江南先民面对如镜子般的静水时,心也会沉静下来,达到虚静的状态。

《越绝书·计倪内经》记载:越地“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

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⑤江南地区一方面东临大海,广阔无垠的海洋,有氤氲磅礴的景象,因舟船的发明,海上交通来往而荟萃四方的逸闻,开阔了先民的思维空间,也刺激了想象力。另一方面,江南纵横交错,蜿蜒曲折的溪流,使先民在表达感情方面,如灵动的溪水一般,更趋于委婉含蓄,这就和北方中原的思想不同。北方的先民,地处广阔的平原,虽北方文明也多发源于黄河、洛河等地区,但在河网密集程度不及江南,而且北方河流以大河为主,与江南相比蜿蜒的溪流相对较少,其地理环境使北方先民的文化思想更多磅礴与务实精神。来自江南地区的现代学者对此有着较为深刻的体验和认知,比如刘师培曾指出:“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22]王国维也认为:“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⑥

三、“质有而趣灵”:

江南学术文化的基本范式

由于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原因,江南学术文化是以“质有而趣灵”的诗性存在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质有而趣灵”语出南朝宗炳的《画山水序》:“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23]“质有而趣灵”作为江南学术文化的基本范式,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依乎自然,肯定“有”;二是这种“有”会向“灵”的方面转化,体现超越性。这种“自然—审美”的江南学术文化范式,有别于当时北方学者讲求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⑦式的“政治—伦理”范式,滥觞于季札、孙武等早期江南学者。

季札(前576年—前484年),姬姓,名札,又称公子札,《汉书》中称为吴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为避王位,不惜“弃其室而耕”^⑧。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称延州来季子。季札比孔子年长,相传为孔子的老师,被称为“南方第一圣人”,有着“南季北孔”的美誉。季札自然通达、博学清言,可谓“质有而趣灵”,是江南学术文化的

① 司马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46页。

② 高诱注:《淮南子》卷11《齐俗训》,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74页。

③ 转引自金克木:《东方文化八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3页。

④ 王先谦注:《庄子集解》卷4《天道》,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74页。

⑤ 袁康、吴平辑录:《越绝书》卷4《越绝计倪内经》,第29页。

⑥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傅杰主编:《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15—316页。

⑦ 左丘明:《左传》卷17《襄公二十四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02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50页。

先行者。

季札的言行,遵循依乎自然的天道观,与北方各学术流派的思想向度有着显著不同。《礼记·檀弓》和《孔子家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季札从齐国返回途中,长子去世,为了免长途车马劳顿,便将他埋葬在赢、博两地之间。孔子这个时候正好在齐国,听说了这件事,就带领着他的弟子前来观葬。孔子和其弟子来到后看到,“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揜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①从先秦贵族的葬礼来看,都是以厚葬为主,季札在吴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其长子去世理应给予厚葬,但季札认为人的身体从自然的土地中来,现在重新回归于土,这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却又相信人死后灵魂还可以存在,且无往而不在,具有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思想。

再次,就是随性自然的学术态度。《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②季札的评论都是听完演奏后立刻给予的评论,并没有多加思索,一方面表现出了季札对周乐的熟知以及高超的学术造诣,另一方面他凭借主观的第一感受进行评论,也反映了江南学者随性、自然的一面。在评论中,季札先后十一次用“美”字来盛赞周乐,这在学术史上是少有的,也是最早将抽象的“美”的概念引入到文艺评论中,具有“质有而趣灵”的特点;同时用“渊”“浹”“荡”“汎”“深”“流”等词语来形容观感,也体现了多水的江南学术文化特色。

再次,还有发自内心的自然深情。《史记》记载:“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③季札交聘中原,路过徐国时,徐君喜欢上他的佩剑,但没有说出口,因为季札出使还要用。等到季札归来,徐君已死。季札专门拜墓,并拔剑相赠。这种“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的行为,这种源自本心的真挚情感,跨越了生死,超越了庸常。东汉时期江南学者王充在其著作

《论衡》中两次褒赞了季札的挂剑行为,并驳斥了传书中季札呼“披裘而薪者”取“路有遗金”的虚言。^[24]其后的魏晋风度实滥觞于此,这是江南学术文化里一直蕴藏着的宝贵传承。

《吴越春秋》中还记载了季札对人生的基本看法:“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处,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④季札自然通达,识见高深,博学清言;爱慕知识,注重内心体验,不事著述,所有这些,都成为以后江南学者的清雅象征。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字长卿,尊称兵圣或孙子。齐国乐安人。至吴国辅佐吴王阖庐用兵,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在吴国所著的《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等领域被广泛运用,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孙武论兵以象尽意,“质有而趣灵”,尤其多以水来比喻战争。“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千仞之溪者,形也。”^⑤他将用兵比为决溪之水,说明军形贵在变化,积攒力量具有气势,这样就能取得胜利。“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⑥用奔流疾驰的激水来比喻说明行军贵在神速,用具体的流水漂石这样形象的现象来说明抽象的军事理论。在《虚实》篇中写道:“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⑦这是把用兵比喻成流水,将流动的水随物赋形的特点和用兵虚实变化的规律反复加以比照,进而总结出水无常形,兵无成势的结论,这种类比推理,是十分贴切形象的。在《势篇》还写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⑧用兵能够出奇制胜,就能如不干涸的江河,不断取胜。孙武用水来比喻用兵,巧妙贴切,十分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孙武生活在多水的江南地区,因此在阐述用兵之道时深受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季札与孙武,一文一武,成为江南学术文化起步阶段相互辉映的双星。

地处江南的越地,计然、范蠡的思想,也具“质有而趣灵”的特征。计然(生卒年不详),姓辛氏,又

① 郑玄注:《纂图互注礼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檀弓下三卷十四。

② 司马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52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59页。

④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2《吴王寿梦传》,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27页。

⑤ 曹操等注:《孙子十家注》卷4《形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⑥ 曹操等注:《孙子十家注》卷5《势篇》,第71—72页。

⑦ 曹操等注:《孙子十家注》卷6《虚实篇》,第101—102页。

⑧ 曹操等注:《孙子十家注》卷5《势篇》,第68—69页。

作计倪、计研、计硯，字文子，号称渔父。自宋国游历至越国辅佐勾践，善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论方略，留下著名的“计然七策”。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就是从自然经济日用中，求“物之理也”^①。范蠡（公元前 536 年—公元前 448 年），字少伯，自楚国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成功复国。与北方士人“政治—伦理”范式不同，范蠡本着自然天道观，功成身退后，主动离开政治，不仅让越王勾践想念，“乃使良工铸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侧，朝夕论政”^②，让后来的读书人所艳羡，而且以崭新的商贸观念，从事“货物所交易”^③，为知识分子走出了一条新路。

[参 考 文 献]

- [1] 李伯重. 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448.
- [2] 陈中原, 王张华. 长江与尼罗河三角洲晚第四纪沉积对比研究[J]. 沉积学报, 2003(1).
- [3] 王开发, 张玉兰. 太湖地区第四纪沉积的孢粉组合及其古植被与古气候[J]. 地理科学, 1983(1).
- [4] 倪华, 吉磊. 从古文遗址看阳澄湖地区环境变迁与湖泊群形成[J]. 湖泊科学, 1997(1).
- [5] 于世永, 朱诚, 王富葆. 太湖流域全新世气候海面短期震荡事件及其对新石器文化的影响[J]. 地理科学, 2000(1).
- [6] 王富葆, 曹琼英, 李弘. 长江口南岸平原第四纪沉积与环境研究进展[J]. 第四纪研究, 1998(4).
- [7] 刘金陵, WILLIAM Y. B. CHANG. 根据孢粉资料推论长江三角洲地区 12000 年以来的环境变迁[J]. 古生物学报, 1996(2).
- [8] 吴锤, 曹柯平. 长江三角洲的史前环境[J]. 东南文化, 2000(9).
- [9] 朱小丰. 中国的起源[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122.
- [10] 童恩正. 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J]. 中国社会科学, 1994(5).
- [11] 刘士林, 洪亮, 姜晓云. 江南文化读本[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
- [12] 董琦. 虞夏时期的中原[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14.
- [13] 朱狄. 艺术的起源[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286.
- [14] 石兴凯. 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J]. 考古, 1962(6).
- [15]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 [16] 林华东. 河姆渡文化初探[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226.
- [17] 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全集[M]. 台北: 台湾大通书局, 1976:1438.
- [18] 林华东. 再论越族的鸟图腾[J]. 浙江学刊, 1984(1).
- [19] 陈文华. 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J]. 考古文物, 1981(2).
- [20]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M]. 北京: 三联书店, 1948:110.
- [21] 艾兰著, 张海宴译. 水之道与德之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34.
- [22] 刘师培.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261.
- [23] 宗炳, 王微著. 陈传席译解. 画山水序[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5:1.
- [24] 王充著. 陈蒲清点吉校. 论衡[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47.

(责任编辑: 闫卫平)

The Commencement of Jiangnan Academic Culture

JIANG Xiao-yu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Jiangnan academia has its independent vein and a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he Jiangnan academic culture commencement and the exploration for 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s, paradigm, and early development are of great value to the motif. Jiangnan is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and surrounded by water, hence its culture niches. The natural poetic spirit, pray worship and lofty mindset rooted in cultural niches are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Jiangnan academic culture. The primary paradigm of Jiangnan academic culture-keeping both original form and content-was originated from some early Jiangnan scholars such as Ji Zha and Sun Wu.

Key words: Jiangnan; Academic culture; Commencement

① 司马迁:《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3256 页。

② 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卷 10《勾践伐吴外传》,第 279 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3257 页。